

# 做跟风者还是引领者

□ 王晓松

又到了全球知名高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更新其核心产品iPhone的季节。在万众瞩目之下,iPhone6如期而至,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大兄弟”——iPhone6 plus。这两款“bigger than bigger”的产品一经发布,就引来了一片嘲笑之声。因为,这一次苹果公司打破了其灵魂人物乔布斯的一个铁律——绝不生产大屏手机——推出了和市面上普罗品牌一样的大屏产品。一时间,人们纷纷提出疑问,苹果是不是一个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是不是也成了科技创新的跟风者?

实际上,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到库克时代的苹果公司,人们一直以来都反复地在追问同样的问题。不跟风普罗大众的喜好、独领风骚,一直都是乔布斯时代苹果公司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这也是苹果公司能够在那个时代一跃成为世界最有价值的高科技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技术层面上看,这也意味着其技术体系的

封闭性,其创新的独创性。而人们之所以选择了苹果产品,之所以痴迷于苹果公司的包括手机等在内的系列产品,其原因也就在于这种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风格。无论是在乔布斯时代还是其继任者库克的时代,苹果公司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都是长时间的领先者,但这并没有妨碍乔布斯顽固地坚持其技术第一的发展思维。而在库克时代,苹果公司的策略开始动摇,其产品的大众化或者说屈从于市场需求的意味越来越浓。从近年来苹果公司发布的各种产品中,大家都可以发现来自市场的呼声得到了体现,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那种苹果产品所独具的新奇感在下降,让忠实消费者们对于自己购买的理由开始大打折扣。

保住市场,确实是每个企业必须坚守的第一生存准则。但为什么乔布斯可以那么自信的控制市场,而库克要屈从市场,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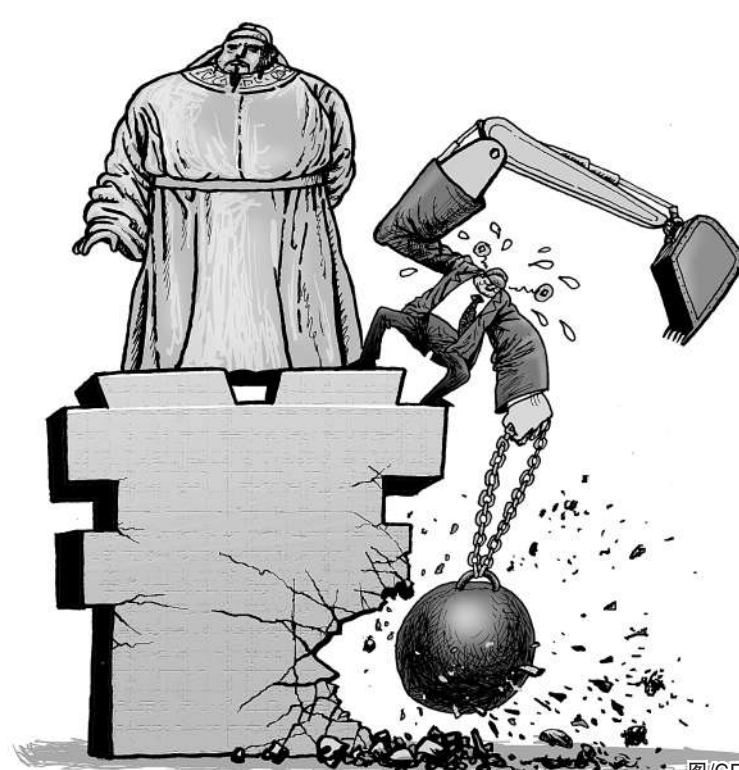
中的秘密值得探讨。在乔布斯时代,领军者的技术研发背景非常重要。乔布斯是一个善于迸发出技术灵感并能够将在创新链条各个环节上付诸实践的奇才。这一点连比尔·盖茨也为之钦佩,他曾对乔布斯传记的作者这样说过:“一体化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史蒂夫·乔布斯在掌控。”而正是由于乔布斯这种超乎常人的能力,打造了一个可以完全封闭又能够引领市场的“苹果帝国”。

可以说,在这个帝国里,所有的设备生产厂商也好,软件提供商也罢,甚至是运营商、消费者,都必须对苹果俯首称臣。帝国运转的核心就是苹果产品,就是强势的乔布斯。但随着乔布斯的离去,帝国在缺乏有力的继承者的情况下,必然陷入土崩瓦解的地步。而为了维系帝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庞大体系以及避免其他对手的赶超,新的继承者的主要发力点就只能保持市场

的占有率,尽最大的可能在市场销售上继续保持现有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苹果公司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跟风者,而不是引领者的主要原因。

就在苹果公司从引领者向跟风者转变的同时,其他的对手想要做的则恰恰相反。很多昔日不屑于苹果公司做法的,在今天似乎要重走苹果公司的老路——开始把引领技术潮流摆在了优先的位置上。在苹果公司发布自己的换代产品前,它的老对手三星公司也发布了自己的换代产品,而且创新味道十足,引领潮流的迹象十分明显。

这种做法看似有风水轮流转的感觉,但却活脱脱地说明了企业在创新上是引领还是跟风的转换法则。当你的对手是一个技术硬碰硬,你必须避开他的风头走市场第一的路线;而当你的对手已经无法在技术上继续领先,转而去争奇斗艳的蛋糕时,你干嘛不去占领技术的高地呢?



图/CFP

## 这个雕像最讽刺

□ 杨雪

前些天,媒体报道了广西柳州市开始拆除尚未完工的位于风情港旁边的柳宗元铜像底座,舆论一下炸开了锅。据建设方称,柳宗元人物铜像计划投资7000万元,将开创两个之最:一是国内最高的人物铜像,二是世界最大的旋转类铜像。项目于2012年动工,不过2013年年中就已停工,而巨大的雕像底座和核心柱子部分已矗立江岸边。

说起来也真是有意思,造像之初所谓的两个之最,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恐怕柳州以及广西之外就鲜有人知了。倒是此像“生不逢时”,落得个拆除收场,反而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还能顺便看场热闹,嘲讽一番。所以呢,耗巨资,造政坛,撑门面,摆乌龙,怎么看都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

近年来,建了拆拆了建的荒唐事太多,光是雕像类就能数出一二年来代表作品。2011年,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在郑州郑东新区建造的高达27米、造价1.2亿元的宋庆龄雕像未完工被拆除。2012年,

新疆乌鲁木齐的“飞天女神”植物花卉雕像仅存活11天被拆除,拆除理由之一竟然是仙女样貌丑陋会吓坏老百姓。

不过,怎么看都是柳州的这个河东先生雕像最讽刺。没错,柳宗元确实当过柳州刺史,而与柳州历史有相关联的人物,大概也数柳宗元是最大的“腕儿”。然而这种花钱纳税人的钱装点城市面子的工程,却完全与柳宗元兴利除弊、造福百姓的为官之道相悖,这一点正好成为最大的讽刺。难道那些做决策的少数人,不懂“贼欲之毒有甚于蛇者乎”?

在打造文化品牌这个问题上,太多城市看不清自己的历史渊源,理不顺自己的文明脉络,找不到文化的根。即便如此,少数人仍然一意孤行,不肯与多数人分享话语权。这大概由于其中利益纠葛太多,成,名利双收;败,不了了之,正所谓恃无恐。

所以,曲终人不散,闹剧过后,少数人继续自我陶醉,乐此不疲,接着酝酿下一出。造像是,城市建设如是,还有许多的类似的问题亦如是。

## 老生常谈“通俗化”

□ 尹传红

前不久,中国科协的离休老干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创办初期的负责人王麦林先生,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刘嘉麒院士、秘书长石顺科研究员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她写的一篇短文,同时也转给笔者一份。读后,我颇有感触。

这位年近九旬的“老科普”,在《关于对当前科普作品想谈的问题》一文中,主要谈的是科普作品的通俗化和科普作品的对象问题。作者坦言:“就我所见过的科普读物,总的印象是:不是很通俗,有的还不容易懂,更谈不上生动。可以说,一般都是平铺直叙,虽然文章写得不错,但没有味道,引不起读者阅读的兴趣,除非是想了解某个问题,才会耐着性子读下去。”

甚至,“一些科普杂志上刊登的科普文章,一般都是用书面语言讲述和讲解某种科学技术,这样的文章是科普文章吗?这样的科普作品与介绍和讲解某种科学技术的教科书和学术报告有何区别?”

科普作品的创作实质就表现在使其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功力上。可想而知,王老所指出的那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影响科普普及或科学传播效果。王老感叹:“这些道理是科普创作界众所周知的,我之所以要老生常谈,是因为现在这样的科普作品太少了,成凤毛麟角。希望科普作家们多多关注和研究……”

我觉得,不只是在科普作品中,其实,在我们日常所见的科技新闻报道,以及财经、金融等报道,也存在着通俗化不够的问题。而在各类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因过于深奥、晦涩、呆板而让读者感到头疼、无趣、反感,进而疏远、避开、放弃,最终影响了传播效果的情况亦非常普遍。还有人(尤其是写作者)把“学术”的“浅显易懂”与“水平低”划上等号,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有这样一题为“简单规则”的揶喻经济学家的笑话——

问: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的必备素质是什么?

答:牢牢地抓住最显而易见的东西,并且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痛苦和深奥的解释。也就是说,使文章浅显或通俗化,就是要尽量用大众化的语言,去描述科学的、艰深的或专业性强的事物。如对比较专门的、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科学技术问题、原理等,能用通俗的语言、适当的修辞手法、巧妙的

谋篇布局等表达出来;对专业术语,能够“跳”出科学家惯常使用的语言思维,用大众化的语言“翻译”出来;此外,文章架构应逻辑清楚,叙述语言要简洁流畅,遣词造句要准确恰当。总之,就是要生动活泼,不板起面孔说教。

当然,科学术语内涵之丰富远非日常语言所及,要在很短的篇幅内把一些艰深的知识诠释、“翻译”清楚,难度可不一般。而此理解和语言更难以表达的,则是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或解读。我们常常能够从一些文章中读到如下“一言以蔽之”式的语句:“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嘿,真是省事!也可见把‘科学’表达好并非易事。要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写作者首先就要做到对表述内容的理解和领悟。而对科技新闻的通俗化要求,跟对科普文章或科普读物的可读性要求,至少在语言和表述方式上是相同或相通的。”

美联社的科技新闻编辑奥尔顿·布莱克斯利把科技新闻写作看成是“一种翻译的艺术”,科技新闻写稿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神秘的科技语言的翻译。他告诉同行说:在进行采访时,千万不要被专家及其专门术语所吓倒。你也正在从事一项专业化的工作——用尽可能简单、明了、有趣的语言为一般公众写报道。天文学家可以只讲自己的专业中的行话的办法使一个化学家感到迷惑不解,反过来情况也是一样;而家庭主妇用地道的专门词汇,则可以把这些两类专家搞蒙。

同样精通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我们的科技新闻工作者和科普作家平时如果能够注意学习和积累,应该能够比常人更快地熟悉科学、把握对问题的理解,进而写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好文章,在传播深奥知识方面取得“信、达、雅”效果。简言之,信,科学内容准确;达,文字流畅通达;雅,格调风雅谐趣。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哲学思想若想在当今世界发挥作用,就必须让大多数人读得懂……他们也是共同求知者,是共同思考者和共同作者……因此,使用尽可能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其思想深度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思想,对于使所有的人都能参与思考世界和人生是非常必要的。”

我想,将上述话语中的“哲学”换成“科学”,亦如是。没有枯燥的科学,只有乏味的叙述。

## 全球创新竞争中的政府与市场

□ 临风

## 科技创新呼唤 破除官本位文化

□ 谢小军

创新是科技进步的阶梯。科技创新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我们国家关注的焦点和社会热议的话题。客观地讲,多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基本态势仍然是在追赶别人的步伐,具有世界性开创意义的成就还不多。这固然有底子不如人的历史原因,也有涉及人才培养、科技体制等阻碍科技创新的现实因素,不容忽视的是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元素也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巨大障碍,官本位文化一日不除,难言创新之康庄坦途。

官本位以官为荣,以官为贵,它包括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以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官本位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但到今天它依然深植于社会思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究其原因,“官”意味着利益、地位和权力,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几千年来大抵如此。

官本位文化也熏染着学术界,并使之产生较为严重的学术行政化倾向,媚官、追官、捧官、争官成为惯常的现象。如今某些科技工作者不先追求教授、研究员头衔,还要千方百计弄个处级的研究室主任、厅级的院长,那样更过瘾、更有面子、更有实惠。学术话语权的过大、学术成果的排名、学术资源的分配有时的不是真理、不是贡献、不是成果,而是谁的官大。“一个机关科长也能否定一个教授专家组的结论”,这不是玩笑,而是某些学术中人对现实的唏嘘感。

官本位文化是创新的第一杀手,当官当官价值替代学术价值,官当逻辑替代学术逻辑,当权力即真理,官位即学术,以行政意志指导学术时,学术将发生异化,例如在“官本位”体制下,产生了畸形的业绩观,一些领导把追求“政绩”以求升迁作为最高目标,政绩最好的表现手段就是数字,于是形成了一种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立竿见影轻韧性坚持之长期探索的制度安排。如此浮躁功利,自然难有创新性的思想和成果,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和垃圾成果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本位文化压抑着学人的自由意志,损害了他们的独立人格,也扭曲了部分学人的性格,使他们唯上是从,缺乏宽容,畏惧权威。“真理惯常的命运是始于异端,终于迷信”,只有勇敢打破这种宿命,才会出现持续规模的创新,使创新成为社会普遍心态的历史定势。这需要包容的涵养,疑问的态度,批判的精神。目前的学术界缺乏包容,容不得怪人、异人,殊不知哪里有什么,哪里就有创造。学术界也缺乏真诚、有勇气、建设性的批判言论,往往是领导和院士一说话,大家都闭嘴了,或者说是避重就轻、无关痛痒的不见声,在“官本位”体制下,以独立、自由与平等为支撑,以怀疑、批判为底蕴,以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为表征的创新人格,唯有此,科技创新才有可能大规模实现,才有可能实现科技梦助推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中美创新对话美方专家组成员、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的新著《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在国内翻译出版。虽然名为“经济学”,但阿特金森博士的新著并不是一本标准的经济学教材,更类似于一份智库的研究报告。读罢全书,给人的感觉是书中充满了“火气”,这“火气”既来自于作者对美国创新政策实施现状的忧心忡忡,也来自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所谓“创新重商主义”的批评。

阿特金森博士在论述创新政策的重要性时,对政府和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也进行了分析。在传统的无法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之外,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几点:一是协调失败对创新过程的破坏。由于复杂的创新活动涉及多个主体,政府在其中的“牵线搭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市场机制下,面对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如果没有利益,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是很难一起协作的,而政府的“有形之手”可以降低研发风险,让各创新主体产生预期利益。二是全球化条件下,谁的创新政策有吸引力,谁就可能吸引到更多的创新资源,而有利于创新政策的市场环境通常是政府“一手”塑造出来的。三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各国既可以形成高附加值、高创新水平和高技能的均衡,也可以形成低附加值、低创新水平和低技能的均衡,仅仅依靠市场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阿特金森博士显然是赞同“有为”政府的,这也是他对那些对美国创新盲目自信、以为仅靠“自由放任”就能自动提升创新能力的批评,他看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有效的创新政策将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有效手段。阿特金森博士关于政府和市场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分析,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中国科技创新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借鉴。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大背景下,具体到今天中国的各类创新活动和创新过程,政府和市场的该到该底该如何发挥作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按照有些人的理解,政府应该少管科

研项目,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上。这种观点强调了政府作用“破”的一面,但是对于“立”的一面却几乎未曾提及。从所谓“创新链”来看,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和创新前技术,通过项目促进产学研结合,出台政策、建立引导基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补贴等手段扶持新兴产业,采取首购订购等措施带动创新产品的需求,可以说,政府的作用几乎覆盖了创新链和创新活动的全过程,政府和市场之间是一种“犬牙交错”、“相互衔接”的关系,而不是泾渭分明、互相独立的关系。

时下提升中国创新能力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大幅度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大学、科研院所占据科研优势的条件下,缺少了政府的协调和制衡,优质科技资源很可能会进一步向大学、科研院所倾斜,形成“马太效应”,本来创新能力就比较薄弱的企业更显得力不从心、困难重重。应当看到,项目也是政策工具的一种类型,与其说政府少管甚至不管项目,倒不如说政府应当管什么样的项目,应当怎样管项目。那些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没听说哪个政府不管项目,美国就是政府部门项目比较成功的典型例子。

在阿特金森博士眼中,政府的创新政策有好有坏,他建议的税收优惠、教育、创新平台属于“好的”,而类似中国的汇率、补贴、知识产权等政策属于“坏的”。他的这种判断当然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一厢情愿”。韩裔英国经济学家张夏准教授在《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密》中指出,这些所谓“坏”的政策,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早就用过的,当它们发现这些政策不再适用自身的时候,就无情地“蹬掉梯子”,并对后发国家指手画脚。如果按照阿特金森博士等开出的“药方”,在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加快、创新能力不平等的背景下,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基本上是一种“美好愿景”,只能亦步亦趋跟在人家后面,而那些在技术能力上成功追赶的国家,没有谁一开始就是按照那些“好的”政策行事的。

尽管当前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出现了“三跑并行”的判断,但大部分仍是跟跑,特别是核心技术能力差距相当大,而

空间。反之,如果参与者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各方观点的差异性,讨论会更加建设性。其次,一个常被忽略但十分重要的事实是,有效的公共讨论需要一套科学的程序、方法和技术提供支撑,它们能够帮助争论中的人们明白如何把问题分解、合并,把讨论聚焦以及累积讨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说,一个社会是否有成熟的公共讨论环境,这些程序、方法和技术完备性和有效性是关键指标。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们获得了更多发表观点的机会,一件寻常琐事也能更容易地转变成一次公共事件,引爆相关的公共讨论。更重要的是,快速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道德原则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行为规则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需要讨论的公共议题非常多。此时,认真思考自己的观点被全盘接受。姑且不说这种情况的现实可能性很小,从基本的态度看,它也并不合理,因为它会让人有更多的情绪卷入,进而可能破坏讨论所需的理性

空间。反之,如果参与者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承认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各方观点的差异性,讨论会更加建设性。其次,一个常被忽略但十分重要的事实是,有效的公共讨论需要一套科学的程序、方法和技术提供支撑,它们能够帮助争论中的人们明白如何把问题分解、合并,把讨论聚焦以及累积讨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说,一个社会是否有成熟的公共讨论环境,这些程序、方法和技术完备性和有效性是关键指标。

在《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争》[美] 罗伯特·阿特金森、史蒂芬·伊泽尔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密》[英] 张夏准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别让公共讨论总是在原地打转

□ 卢阳旭

最近,媒体又集中报道了几起因公交车让座而起的争议和冲突。虽然类似的事情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闻,但由于它能轻易地触及道德话题,各方又总觉得自己有理可依、有话说,吵得脸红脖子粗也不算意外。但实在来说,从实际讨论来看,大部分发言了无新意,建设性更是无从谈起。

也许人们会说,道德原则关涉对错问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来泾渭分明,如果常说常新,那岂不乱套?说的没错。但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概念,即道德原则和道德原则优先序。道德原则必须是价值起点清楚、内在逻辑严格一致,但道德原则优先序则总是充满内部张力。一般来说,公众关于道德的讨论,通常围绕后者展开。

公众关注道德议题,更具体说,关注不同道德原则间的优先序问题,并就此展开公共讨论,没有错,而且应该如此。但需要指出的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做事情与做正确的事情一样重要。无需否认,讨论道德相关议题时,人们会有更多的情感投入,但它并不能成为我们把关于道德的公共讨论

变成公开斗嘴、斗气的理由。换句话说,虽然在相关讨论中完全排除情感投入和情绪干扰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让讨论沉湎在情感和情绪中,公共讨论所需的理性空间就将受到破坏。

遗憾的是,从这几年的争论来看,虽然公共讨论时常被触发、拓展,但最后基本都沦为各方相互斗气。更糟糕的是,斗气一次不够,下次一有机会还接着斗。如此,精力投入不可谓不多,然而讨论却只是在原地来回打转,观点、证据没有在讨论中得到持续积累,相关思考自然也就因缺乏必要养分而始终“严肃”不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我们热情地投入到诸如该不该让座这类具体问题的讨论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更好地讨论这类问题。首先,从参与心态看,日常讨论中,人们常会不自觉地希望自己的观点被全盘接受。姑且不说这种情况的现实可能性很小,从基本的态度看,它也并不合理,因为它会让人有更多的